

02
寶坻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天津市宝坻县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封面题字 启 功

封面设计 杨普年

宝坻文史资料选辑

第五辑

编辑者：宝坻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地址：宝坻县城内广川街5号）

印刷者：天津市宝坻县第四印刷厂

津宝文图字（92）第051号

工本费：2.00元



毛泽东主席于1964年冬接见陈永贵和邢燕子。



1973年8月，周总理和侯勇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
天津小组会上。



邓颖超和邢燕子
亲切握手。



“三个姑娘”今相会
(从右向左)侯隽、邢燕子、张秀敏(铁姑娘)摄于1993年1月5日。

目 录

家乡的生命力仍在推动我前进·····	刘进中(1)
往事难忘·····	邢燕子(16)
永远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侯 隽(35)
大学生摇篮·····	徐洪志(44)
我的心理学之路·····	马志国(56)
对宝坻县农业合作化的回顾·····	许有君(68)
宝坻城关“清真寺”重建纪实·····	王立国 王新民(81)
捣毁前鲁沽据点纪实·····	陈光星(84)
智取敌炮楼·····	张士嘉(91)
我知道的七路军和九路军·····	张士嘉(93)
日军侵华罪行录	
编者按·····	(96)
简述日军侵华在宝坻的罪行及宝坻人民的抗日	
活动·····	王静泉(97)
四里港惨案亲临记·····	赵 平(105)
说说我村的“三七”惨案·····	刘宝起(110)
谈谈日本鬼子在南庄子杀人的经过·····	任秀兰(114)
回忆回家庄惨案·····	李广文(117)
柴崎罪行录·····	(119)

EA35/21

一次震慑人心的杀人演习·····	吴德厚等(124)
杀头示众·····	梁金印等(126)
用活人作刺杀演习·····	丙中(128)
日军侵占宝坻电文·····	(129)
宝坻几个村庄名称的有关来历·····	宝年 丙中(130)
宝坻著述考·····	缪志明(134)

家乡的生命力仍在推动我前进

刘进中

我虽已是九十一岁高龄的老人，但仍时时怀念生我养我的故乡。1992年，我特意不顾长途跋涉，从北京返回家乡，看看家乡这几十年的变化。

我是在满清封建王朝末年出生在旱涝灾害极为严重的宝坻县属黄庄镇的一个张姓家里。我出生的那年是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攻占我国首都北京，签订侵略我国的辛丑条约的那一年。那就是说我在祖国遭受灾难时刻出生的。在出生前夕，在母胎里几乎死亡。我的母亲为着逃避过路洋鬼子的迫害，逃到村外芦苇塘里藏身。天寒地冷，再加上惧怕，使我在出生前就遭受灾难。

在我出生后青少年时期，经常患病，一是“打摆子”，二是拉肚子。我是在这两种病折磨里活下来的。“打摆子”也叫“发疟子”。发病时体温下降，冷得使人发抖。冷后又发高烧，热得如同火烤。这样忽冷忽热，每天犯一次病。这样用冷和热摆弄折磨人的病故名“打摆子”。拉肚子就是泄肚。农村人因贫穷，习惯喝带有细菌的生冷水，常闹肚子疼，甚至泄肚。生冷水在春旱时来自泥水坑。秋涝发大水后来自大水洼。在春夏之交，天旱少雨，泥水坑的死水就成了宝贵的饮料。口渴时就喝这种冷水。水缸里常有细微的虫声。妈妈说这是小龙在叫，不要怕。不懂卫生的生活习惯使我每年都打摆子，甚至染上上吐下泄的霍乱病。

为着保住我这条小命，妈妈使用了三种保命的办法。一是“召魂”。当我卧床患病时，妈妈认为我的魂灵丢失了，必须把我

的魂灵召唤回来。在夜晚妈妈到院里低声呼唤：“小增儿，跟妈妈回家吧，妈妈接你来了。”我在屋里听到这样的呼唤，觉得很奇怪：我睡在屋里，为什么到院里去找我？

但这种“召魂”术治不好我的病，妈妈又采取了第二种保命的办法。那就是“认干妈”。我母亲请求一位子女众多的妈妈接收我作她的干儿子。这样，我就能象她的儿女那样健康地活下去。我给这位妈妈磕了头，叫了一声“妈妈”，我就成了她的孩子了。但是我的病仍未减轻，我的亲妈妈不得不采取第三种办法，那就是当“假和尚”。我被带到一个大庙里，剃光了头，穿上和尚的道袍，给寺院里的老和尚磕了头，我就成了长命的“假和尚”了。

我这条小命居然保住了。难道是这些落后无知的办法的效果么？当然不是。我很幸运，我有一位懂中医的伯父。他很关心我，是他用中药保住我这条命的。由于不懂卫生，传染病不时发生。如无中药的治疗，我的小命必然被各种传染病夺走了。

我首先介绍我出生后的生活情况是说明家乡的贫困落后造成的苦难，在我思想里是根深蒂固的。这次还乡是带着这种落后心情回去的。宝坻县是否已经摆脱了贫困，尚不能肯定。当我进入县城时才大吃一惊。宽阔平坦马路两侧的高楼大厦使我觉得如在北京的马路上。当我走进一栋白色大楼时，楼门的自动开关使我觉得好象进入了北京饭店。难道我的穷困家乡真发生了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么？楼顶上挂着的“宝坻宾馆”四个大字使我无法不承认家乡的变化。但是似这样的个别现象是不易改变我的顽固头脑的。经过县领导向我介绍了本县工农业的巨大发展后，我仍认为耳闻不如目睹。我参观了出口西装的服装厂，访问了农村住户，我还到各条街道上广为游览。最后我才对八十年代初党中央制定的“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战略决策的巨大收获有了感性认识。特别是对于宝坻县人民执行党的政策的坚定性，使我再一次受到家乡性格的教育。使我更深刻地认识了我的一生中未被贫

苦和困难所吓倒是因为有老家的传统性格在支持着我。

黄庄大洼的洪水没有冲垮我的青年上进心。我坚持了青年人必须读书前进。我向我的父亲提出我要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是有名的中学，但费用很高。我的父亲本无力供给我在这个学校念书。甚至他不打算让我上中学念书。但我的上进志愿感动了他。他凑足了一些钱送我到天津考入了南开中学。我的钱只够交学费和住宿费，没钱交饭费了。举目无亲，怎么办？饿了一天没吃饭。在校外卖油条的小摊子周围转，忽然见到一位同学到小摊子处拿了三根油条就走了，没有付钱，小摊子主人也没说话。我感到很奇怪，问卖主，为什么不要钱？我得到的回答是：“少爷们一时没带钱没关系，可以记账。”我的肚子趋使我冒充有钱的阔少爷，一下子吃了三根油条就走了，一连三天没有挨饿。当我的父亲给我送来几块钱后，才还了油条的救命账。就这样我的上进心使我读完了中学。因为我的父亲为着满足我的上进志愿，不得不到一家私塾房教书。每月只赚六元钱。

我的父母供给我在南开中学读出直到毕业是多么不容易呀！在我等候毕业考试时，他们才松了一口气，完成了培养我的责任。怎能料到因领导学生的反帝和反军阀的运动，在毕业前夕被学校开除了。怎么办？我如何回家见父母？我感谢我的父母，我们对我没加任何责备。他们没使我的上进心受到任何挫折。穷困没有阻止住我进入中学读书。没有中学毕业文凭也不能阻止我进入大学。我一定要进入大学。

上进心是生命力的表现。人有了生命力就有勇气，有智慧。我估计南开中学的校长张伯苓先生对我是很关心的。他开除我，是反动政府的命令迫使他不能不这样做的。他一定关心我如何升入大学问题。经过我向他请求帮助，他作为保证人，介绍我进入了北京的燕京大学。

我在燕京大学读书四年，毕业前夕，1927年北伐革命战争

从广东开始了。不少同学离开了学校，投笔从戎，前往武汉，参加了北伐军，我是其中的一个。我在北伐军先遣队，号称铁军的由叶挺任师长的部队政治部工作。我在武汉最大的收获是读了《共产主义ABC》一书。这是我读到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开始，使我的不怕穷苦和敢于斗争的性格得到了理论的指导，使我在生命的长途上获得了方向盘和指南针。

但是掌握这个人类历史的方向盘是如何的困难呀！如果不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下苦功夫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单凭个人自发的感情和意志，就必然走到歧路上去。我曾下了一年的苦功夫，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懂得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懂得了人剥削人的本质，懂得人类怎样才能进入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学习对我非常重要，使我在蒋介石大屠杀年月没有走错了路。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屠杀，所谓“四一二大屠杀”，是在一九二七年四月，革命北伐军进军时期，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武装农民和打倒封建军阀的革命政策。对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大屠杀。他的政策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许放走一个。”在这样的白色恐怖时刻，我应该怎么办？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我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否应该放弃？我没有为着活命而喊“蒋介石万岁”，而为着巩固我的社会主义信念，于这年七月在北京宣誓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共产主义事业的开始。八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使我紧紧地依靠党组织，经受了各种政治风浪，渡过这样激流险滩，保持住了对党的革命事业的信心。

在地下革命斗争年月，党组织不时遭受破坏。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是被枪杀，就是被监禁。我在敌人的枪口下，幸未倒下，但被捕坐牢和监狱斗争却在我的生命里写下了有趣的一页。当日本侵略军占领我们祖国大片土地时，我和我的老伴蓝萍被党组织派到日寇占领的天津市侦察敌人的军事行动。日本的宪兵制度是

世界有名的，在它所统治的地区作秘密工作是很困难的。根据我们对他们斗争的经验，他们有很厉害的一面，因而我们遭受很大的破坏，但是他们也有愚蠢的一面，我得以从他们的监狱里脱逃，我的老伴能被释放就是一例。现在就谈一谈这段牢狱斗争的故事。

到敌人占领地区作秘密工作必须做好掩护工作，才不至于被敌人发现。因为我的父母在天津是老住户，我们可以住到他们的家里。这是第一个方便条件。第二我们必须携带我们的幼小的儿子作掩护，敌人就不会怀疑我们是抗日人员。家庭掩护是革命工作所必须。如发生问须，全家老幼都可能被杀害。为着祖国的命运就必须有牺牲全家老幼的决心。

我们多年离家后忽然返家，我的老年父母当然很高兴，但他们心里明白，我们绝对不是回家探望他们二老的。他们一面担心我们给他们带来灾难，又一面给我们以大力帮助。

第三个掩护是职业，无家无业的单身汉很容易被敌人怀疑。在一位老同学的帮助下，我成了他的化学制品公司的副经理。我不但有了职业掩护，还使我能进入日寇的军事机关谈生易。因为我们公司所制造的药品是防锈剂，对军队很有用。有一次我进入日寇的军事机关的大厅里，看到墙上的大标语。“谨防间谍”四个大字。我心里好笑，间谍已走进你们的家里了……

三种掩护工作都做到了，我们有了家庭的掩护，职业的和生活的掩护后才能以当地居民的身份居住下来。我们的老年父母和幼年儿子都陷入掩护我们秘密工作里了，随时有被敌人发现的可能。如无把全家老幼献给祖国的决心，这工作是无法进行的。

我们的工作还得到了许多老朋友的帮助。但是最困难的工作是侦察到的敌情怎样迅速地向千里外的党组织运送。情报的时间性很重要，必须及时送到。靠地面交通是很慢的。我的老伴蓝萍在

莫斯科留学时学了架设秘密电台的方法。她在天津架设了我们的秘密电台，把我们获得的重要情报及时得以拍发。

由于工作顺利，我陷入了麻痹大意的状态里。例如我们拍发电报的住房上有人走动，我虽看见了，但我还不警惕。结果被敌人的测向机测知我们的住处有秘密电台，遭到破获，我们夫妇被日寇宪兵队逮捕。

当我被关押在秘密牢狱里时，我心想我的献身时刻到了。很惭愧这一生对祖国没做多少贡献。在我就义前不知我的全家人的命运如何。特别是我的老伴不知现在怎样了。她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福建省人。我们在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时相识的，经过交往，结为夫妇。离开学校后，共同参加秘密革命的地下斗争。共同被党组织派到列宁故乡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相信这次监狱斗争，她必能保住革命气节。

我们三个孩子，大儿子和女儿在幼年时被送到莫斯科国际儿童院收养。因为在激烈的革命斗争中无法抚养他们。小儿子带在我们身边，做我们工作的生活掩护。他虽然不到一岁，被抱在怀里，但却能作掩护我们夫妇的工作。因为抱着孩子的夫妇必然是“安分守己”的老实人。我们夫妇多次通过敌人封锁线的关卡而无阻碍，这个怀中的孩子起了掩护作用。不知他的命运如何，可能和他的亲父母一起被敌人杀害了。

我本以为我的生命即要结束，未曾料到没有那样简单，却遭受敌人软硬兼施的更大的磨难。首先敌人用硬的。敌人逼我供出我所参加的抗日组织以及我所知道的一切抗日人员和我的领导人。我回答说：“我没有领导人，我的工作是我独立的，我领导我自己。”敌人又逼我供出我所知道的抗日组织。我回答说：“由于你们残暴地杀害，抗日组织不得不保密，我一个也不知道。”敌人逼不出我的口供后就给我施加了电刑。敌人在我腿上通了电线，使我遭受电击的痛苦。敌人问我：“该说实话了罢？”我的回答

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就这样给我上电刑不下十次，我都忍受下来了。最后我假装着已不会说话了，敌人不得不停下来。

敌人用硬的一手没有使我屈服，就改用软的方法来征服我。我被从阴暗的大牢里带出去，送到院里一间小平房居住。我吃惊地发现我的老伴已在这里。我们夫妻在这里团聚，感到意外。在这里只有一个日本宪兵看守。我们身上的刑具也都取下来了，大小便可以到院里的厕所，我们也可以谈话。我们在受审讯时保住了革命气节，没给革命带来任何损失。因此我们的爱情就更深厚了。敌人用苦刑未能使我们屈服，现在改用软的办法，把我们夫妇安置在一起，难道就能达到目的么？

这时敌人对我的态度已不是审讯，而是谈心。敌人向我表示：只要我不再抗日，就可放我出狱。我回答说：只要日本不侵略，我就不抗日。敌人向我诱骗，只要我能把共产党活动情况向他们报告，就允许我仍作共产党员。敌人并威胁我说，我如不按照办理，就使我的全家老少消灭。

我们夫妻在发现敌人的秘密收买政策后感到这是敌人对付共产党人的新政策，必须向党报告，使党注意审查曾被敌人逮捕又被释放的共产党员有无被敌人秘密收买变节问题。敌人使用科学技术对我们斗争，破获了我们的秘密电台，致使我们夫妇被捕。这是我们对敌人的武器估计不足的结果。但在思想斗争方面，敌人是愚蠢的。他们对共产党人不怕死的性格不知如何对付。我们既然不怕苦刑，难道我们却怕诱惑么？但是敌人的秘密收买的办法是一种新办法，必须向党报告。我的老伴建议口头上答应敌人，当敌人对我们的监视放松时，逃出去。我认为两个人逃跑是不可能的。她让我一个人逃。我说我们是夫妇，又是革命同志，更是难友，我怎忍心把她一个人留在牢狱里？我逃走后，敌人必然更残酷地折磨她。我的老伴坚定地说：这不是逃跑而是向党送重要情报，当然只能一个人逃，不要怕，她愿承担一切后

果。

我被她这种坚决勇敢的精神所感动，对她发出了以往所没有过的敬佩之情。我们开始寻找逃狱的机会，夜里不睡，做必要的准备。我必须有一个所谓“良民证”，是日寇统治者发给居民的。我的“良民证”在被捕时已被敌人没收，敌人在街道上的岗哨，随时查看“良民证”，我如没有“良民证”就寸步难行。我在打扫牢房时从墙角里捡到一位难友遗留下的一个“良民证”。这证件上的姓名是刘进中，三十四岁，天津人，军服缝纫工厂的工人。照片上没有什么特殊痕迹。年岁和我的差不多。这证件对我很有用，使我有了逃出去后身份证件。对我来说这证件太宝贵了。增强了我越狱的信心。我们夫妇整夜不睡，等候逃跑的机会。

那是在冬季一个夜晚，日寇的看守犯人的宪兵队在大吃大喝，庆祝日本的什么节日。在我们住处只有一个看守的宪兵，也在半醉里打鼾。我们夫妇认为时机已到，紧紧握手后，我向看守兵说，我到院里厕所去。他向我摆了一下手。意思是说，他不跟我去了，我可以一个人去。我走出住室，院中很黑，我走到大门，看大门的兵不在，大门也没上锁，我就从门缝里溜出去了。

越狱成功后，我到哪里去？我党的秘密组织，如我被敌人发现，就要连累党，如躲在朋友家，有可能被敌人用查户口方法找到，就又连累了朋友。只能到一个同志家，换掉牢衣，借了些钱后立即逃离天津到农村去。我的老家在宝坻县黄庄镇，道路很熟，跑了一夜天亮时到了老家，在一位老爷爷家里住了一天，又向东跑，找到了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见到了司令员李运昌同志。他派了两位战士，护送我前往延安。在沿途走了五个月，受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敌后农村抗日人民的英勇机智使我坚信中华民族绝对不会失败的。到延安后我把在沿途上的见闻写成一本书，叫《奔向延安》。

我的老伴那种甘愿自己牺牲，支持我逃狱的革命精神给了我

巨大勇气，使我战胜各种困难到了延安。但她怎样了呢？挂念之情紧系我心。我到延安后住在“蓝家坪”。我的爱人恰好姓蓝，难道我到了她家了么？她可能在我脱逃后已遭到敌人的杀害。我整日吃不香，睡不安。怎能料到在日寇投降后我们又重新团聚，直到我们进入老年。她因长期坐牢染上的病症，在她年近八十时溘然长逝。但她的革命志气仍在鼓励着我前进。

当敌人发现我已逃跑后，想方设法，企图把我抓回去。因为我的案件已是日本军部直接管理的案件。看守兵不敢向上报告，企图利用我的爱人的线索把我找回去。敌人把她放回家去，用她的名义登报，要求回家。敌人在我家近邻监视，等我回家时抓到我。

上文已提到，在技术斗争上我们失败了，但斗智方面，敌人却没有斗过我们，我却到越狱后逃到延安去。敌人要我的妻子带领着敌人到北京和天津所有我的亲戚朋友家里去搜查我。所以敌人没有虐待她。直到日本投降，把她交给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监狱关押起来。当国民党和共产党和平谈判时，我方要求对方把此案交法院公开审判。对方只得照办。我方请了律师在法庭上辩护说：“被告因抗日战争被日本宪兵关押起来了。日本投降时把犯人交给国民党。难道国民党现在也定她抗日罪么？国民党无言以对，只好宣布无罪释放。我们夫妻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得以重新携手投身革命。

我的老伴是一位性格温顺的人，没有和任何人吵过嘴，打过架，甚至没有在背后说过人的坏话。我万没料到在监狱斗争中她是那样英勇，那样坚定。我如没有她的支持我不可能从日寇宪兵队监狱里逃出的。我如不能逃出，我哪能有现在的后半生。因此，在我有生之年，时刻也忘记不了她。也可以说，我的大半生是她帮助我获得的。因此我把她介绍给我的家乡，她没给我的家乡丢脸。

我逃到延安后接受了党组织对我的严格审查后，认为我在敌人的监狱里没有做对不起党的事。我改名为刘进中，用以纪念那位难友。由于我有对敌斗争的一些经验，遂被派到党的保卫部门工作，参加了保卫党中央的工作。我深深地感谢党给我安排了这样的工作，使我有机会能亲眼看到毛主席的伟大人格。因而我热爱这工作，直到我离退休。我认为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最伟大人物，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第一流的伟大人物。现在向我的家乡汇报一下我对毛泽东的认识。

一是毛泽东挖中国封建社会的根子最彻底。中国封建社会的根子可能是世界各国最深的国家，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从汉朝发生的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反封建革命运动起，直到满清年代的太平天国革命都失败了，未能推翻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广大农民的封建制度。只有毛泽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总结了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失败教训并结合了我国的具体情况，创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农村武装根据地，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方针。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就是在这种方针指导下取得的。

如果不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就不懂无产阶级为什么能战胜剥削阶级，共产党为什么能成为领导革命的党。作为中国人如果不研究学习毛泽东思想就不懂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一个青年人如果不懂毛泽东思想就很容易迷失方向。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人的一生既要懂得马克思主义，又要懂得毛泽东思想就能掌握人生的指南针，不至于走错了路。我对此有切身的体会。

第二：毛泽东坚持大义，不被个人恩怨所影响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和杀害毛泽东的狠心已达到极点。1936年他亲自到西安，指挥他的部队向延安进攻。他在报纸上多次发表声明，凡是能杀掉朱德和毛泽东的人奖赏十万元大

洋。但东北军总指挥张学良将军主张联共抗日，反对打内战，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在共产党内和东北军里有些人主张杀蒋抗日。蒋介石杀了无数的共产党员正好杀蒋为他们报仇。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弟弟毛泽民等五口家人被反动军阀杀死了，此刻正好为死者报仇。怎能料到当蒋介石被迫口头同意国共合作抗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同意释放蒋介石返回南京。未因旧仇而加以报复。当时曾有不少党员反对释放蒋介石，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如不放蒋介石，南京政府的亲日派，国防部长何应钦等正好借口为蒋报仇出兵打八路军新四军。这正是日本侵略者所希望的中国打内战。这样一来抗日救国大业就遭到破坏。中国共产党大义凛然，决不把党的利益摆在民族利益之上。我由衷地认识到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代表人物。

第三：毛泽东不但有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而且有救国救民的献身精神和战胜敌人的智慧。现把我亲眼见到的几件事介绍于下：

（一）毛泽东最后撤离延安

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之心并没有因为在西安被释放而减轻。日本投降后，他再一次派军队大规模的进攻延安并派飞机企图把毛泽东炸死。他以二十二万大军向只有二万人的共产党军队进攻。长趋直入，直到离延安只有三十里路的村庄，三十里铺。战场上的枪炮声在延安城里已听得很清楚了。但毛泽东仍在城里未走。我作为一个保卫人员很焦急，毛主席再不撤走就很危险了，必将被敌人围在城内。毛主席却在命令大家把窑洞都打扫干净，把马克思主义各种书刊摆在桌子上，表示对蒋军的欢迎。他一再问，城里的老百姓都撤出去了吗？他说：“在陕北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十多年，现在敌人来了，我们却先跑了。能对得起老百姓么。”最后大家说老百姓都撤走了，他才不慌不忙地离开延安。这时大家才放了心。